

創傷知情照護於法院會面交往 服務之實踐——以臺北地方 法院家事服務中心為例

黃心怡、劉于瑞、蕭丞芳、李季蓉、徐慈心、
莊怡萱、陳嘉鴻、鄭又維、蕭秀平

壹、研究緣起

根據內政部（2024）統計，2023年我國因父母離婚而涉及未成年子女親權歸屬之案件數（人數）為50,359件，此一數據顯示當年度有超過五萬名未成年子女面臨父母離異的情境，然這些孩子在父母離異後是否仍能與另一方父母保持連結則不得而知。此外，根據司法院（2024）統計，2023年有2,838個未成年子女透過地方法院酌定監護權歸屬，意即平均每天約有8個兒少捲入父母離婚的監護權爭奪戰，成為父母之間的夾心餅乾。

臺北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自2014年成立以來，提供家事案件相關服務至今已10年，實務經驗顯示，法院離婚案件中有許多屬高衝突家庭，在涉及未成年子女與探視方會面交往議題上往往遇到諸多挑戰，無論

是父母關係糾葛、訴訟攻防引發的高張情緒，導致會面中斷，或因探視方過往非主要照顧者，而與未成年子女關係疏離、親職能力不佳等多重因素，都對會面造成負面影響。而在司法歷程中，為協助確保法院所擬定之會面交往方案之品質與可行性，本中心發展出法院會面交往服務，期能藉此幫助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爭訟過程中，持續與探視方保持連結。

會面交往又稱探視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明定，針對與父或母分離的兒少，持續與另一方父母保持關係與聯繫是兒少的重要基本權利。離異家庭的兒少仍會期待與父母任一方皆保持依附關係，渴望父母如往常付出愛及照顧，鄧學仁（2022）指出透過會面交往可讓兒少理解探視方仍然深愛其，有助於兒少自我認同的建立；然若是非合作的父母，便會影響兒少與探視方會

面的穩定性，而可能令兒少產生較強烈的負向情緒，例如：感到被拒絕、失去信任等，年紀較大的兒少可能會選擇先拒絕探視方，減少自己被拒絕的受傷（Wallerstein & Kelly, 1996）。

Felitti等人（1998）發表關於童年逆境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的研究，探討童年時期的創傷經驗如何對其身心健康造成長期影響，該研究列舉十項童年時期的逆境經驗，其中，父母離異或分居致兒少失去一方父母，被視為一項重要創傷指標。本土研究指出，許多父母離異的兒少面對無法合作、甚至相互攻擊的父母，可能因此出現兩面討好、鑽漏洞、說謊以滿足自身需求等問題行為；有些兒少可能因父母仍深陷在受傷的狀態中，感覺被忽視，使其缺少來自家庭的支持，進而轉向其他複雜的同儕團體尋求歸屬（黃心怡等，2020），這些都是高衝突家庭可能對兒少造成的負面影響。

因著服務經驗累積，我們體認到對處於高衝突關係中的父母或夾在成人之間的未成年子女來說，會面服務很可能成為再一次的風暴，而若細究每位來到我們面前的父母或孩子，其實也都因為過往互動的負向經驗早已傷痕累累，此一發現促使我們引入近幾年國內外均蓬勃發展的創傷知情照護（Trauma-Informed Care，以下簡稱TIC）於會面交

往服務中。儘管國內已有許多組織或機構辦理相關訓練、進行研究與推廣，但迄今尚未有針對法院會面交往議題進行相關探究。因此，本研究為國內首次以TIC概念探討會面交往服務，期能藉此重新檢視本中心會面交往服務的品質，進而減少家庭創傷經驗的累積。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期望探討如何將創傷知情照護實踐於法院會面交往，此段將先介紹創傷知情照護之概念及實施原則、法院會面交往服務，最後則是闡述高衝突家庭會面交往與創傷之關聯。

一、創傷知情照護

創傷（Trauma）一詞根據美國藥物濫用暨心理健康服務署（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以下簡稱SAMHSA）（2014）之定義，「是由一次事件，一連串事件或一系列情況所造成，對經歷其間的個人而言，在肢體或情感上有傷害或是對生命具威脅性，並且對個人的功能運作，以及生理、社會、情感或靈性的狀態形成長期的不利影響」，Judith Herman（1992）指出創傷的核心議題是喪失權能（Disempowerment）及失去連結（Disconnection），使人失去安全感及

控制感。因此，創傷知情是一種看待服務對象的眼光，以建立安全與正向的關係為核心理念，實施步驟包含理解創傷（Realize）、辨認創傷（Recognize）、利用創傷知識做回應（Respond）及防止再度受創（Resist Re-traumatization），強調具有創傷知情概念的工作者，應理解創傷對服務對象的影響，並能辨認服務對象的創傷反應，運用創傷知情的視角重新詮釋服務對象的情緒及行為狀態，理解在他人眼中的問題行為可能是服務對象在創傷環境中求生存機制，而非病理化其身心症狀，工作者進而應檢視政策、體制或服務過程中可能重現、誘發創傷的情境，調整工作者面對服務對象的方式，避免使服務對象再次受創（SAMHSA，2014）。

回應TIC的核心理念，SAMHSA（2014）提出六大實施原則：安全（Safety）、信任感與透明（Trustworthiness and Transparency）、同儕支持（Peer Support）、合作與互助（Collaboration and Mutuality）、賦權與選擇（Empowerment and Choice）、文化歷史與性別（Cultural、Historical and Gender）。安全是指提供服務的單位應確保服務對象身體與心理上的安全；信任感與透明是指提供服務的單位應與服務對象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並確保政策公開透明；同儕支持是鼓勵服務對象與

其他有相似經驗的人建立相互支持、陪伴的關係；合作與互助重視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之間平等及相互合作的關係，工作者應與服務對象共享權力、一起做決定；賦權與選擇指出工作者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應重視服務對象的復原力，幫助其擁有選擇權及自主權；文化、歷史與性別則強調工作者應具備文化敏感度，尊重多元文化，理解個人所處的文化脈絡如何影響個人對創傷的詮釋及回應，避免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刻板印象，並看見歷史創傷的影響（SAMHSA, 2014; Roberts et al., 2019）。

二、法院會面交往服務

根據我國《司法院辦理補助駐法院家事服務中心辦法》，家事服務中心是協助在法院有離婚、監護權等家事事件的當事人和未成年子女，提供陪同出庭、心理支持、親職教育、法律諮詢和連結資源等福利服務。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自2014年起承接本中心家事服務，並於2015年開展法院會面交往服務，本中心會面交往服務雖未有明確受案要件，然考量場地安全措施、服務目標及需求等因素，原則上僅接受法官轉介之案件，針對未有家庭暴力或非嚴重暴力家庭，提供有限次數的會面服務，以完成階段性任務為主要目標（黃心怡等人，2020）。

由於法院訴訟中的父母往往關係已降落到冰點，且在訴訟程序中，雙方動機多處於追求自身最大利益或彼此攻防，往往無法顧及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因此對於主動配合共親職等服務意願均低，也造成實務上均需仰賴法官支持，即藉由法官書面的轉介，方能使服務有機會推展與執行，故除非社工於家事商談服務過程中討論到未成年子女照顧計畫，並評估案家有會面服務需求、且父母均同意接受會面服務，本中心會面服務原則上僅接受法官轉介。

服務對象部分，許多高衝突家庭未曾有過家暴，而是因父母分居或離異，導致未成年子女與探視方的互動中斷，或因過往探視方與未成年子女關係較疏離，需要修復關係或重新建立連結，而現有社區服務中，也鮮少能提供是類家庭會面交往服務，須透過本中心會面服務協助漸進式的修復或重新建立親子關係。此外，少數家庭雖曾有家暴通報，但經評估其主要暴力乃偶發伴侶衝突，或因爭奪親權等家事議題引發之家暴事件，本質上非權控的暴力，其在會面交往之人身安全保護強度未達需進行監督會面交往服務時，亦可納入法院會面交往服務對象。

由於法院會面交往服務，主要目標在於協助未成年子女與探視方重新創造正向經驗，因此著重在促進親子關係的

重新連結與修復，同時也考量人力場地等結構限制，目前服務次數以4-6次為主，以完成階段性任務為目標，期能幫助父母與未成年子女於此過程中建立信任關係及安全感，進而回歸社區自行會面。

三、高衝突家庭的會面交往與創傷

Johnston與Straus（1999）研究指出，高衝突家庭或家暴家庭的兒少易對世界產生不信任，因父母之間的衝突、敵意、恐懼等情緒，加以父母情緒行為的反覆無常及無法預測性，使兒少需要時常懷疑何謂真實，導致其長期處於過度警覺的壓力狀態，而對所處環境產生高度不信任及缺乏安全感。因父母離異而有會面交往需求的兒少，往往被不合作的父母逼向忠誠的兩難，兒少需要擔心跟探視方會面後，返家時是否需面對同住方的負向情緒等，因此許多兒少為了生存，會透過管理自己的情緒行為表現來照顧父母的情緒，使其必須成為雙面人。而有時父母雙方都會迫使兒少成為傳聲筒的角色，令兒少因會面探視承擔愈來愈多的情緒負擔，最終可能引發兒少對會面的反感及拒絕，會面反而成為兒少的創傷經驗。

法院在親權判定上強調子女最佳利益，近幾年更著重「合作父母」、「友善父母」原則，即民法第1055-1條第1

項第6款：「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即善意父母條款），而父母是否為合作父母或以合作父母為目標，最具體的行為展現，就是父母在會面交往共親職上是否順利。

本會於2022年曾進行「爸媽離婚了，孩要見不見？——高衝突家庭親子會面」問卷調查，針對目前育有未成年子女、且因離婚或分居而需與對方進行親子會面的父母進行調查，共回收477份有效問卷。調查顯示僅有24.7%的受訪者與對方有較順利的會面經驗，結果指出離婚父母不合作的會面交往行為，最嚴重的分別為「父母互不聯繫或拒絕溝通，把孩子當傳聲筒」、「在會面現場爭吵，讓孩子目睹衝突」及「會面過程中拍照、錄影，想作為蒐證與訴訟之用」（現代婦女基金會，2022）。對孩子而言，若父母在會面過程將其當成傳聲筒，便會使孩子夾在父母之間左右為難、承受龐大壓力，而排斥會面；若父母一次次在會面現場發生衝突，使孩子目睹，孩子會覺得是會面造成父母的爭執，對會面心生恐懼，寧願選擇不會面，以減少目睹情境；若父母任一方在會面現場進行蒐證，便是將孩子捲入父母的衝突和訴訟中，孩子會擔心自己在會面時的發言或行為反應，成為父母訴訟的工具，成為孩子會面時的壓力，孩

子可能會乾脆拒絕會面（現代婦女基金會，2022）。父母的不合作行為均會讓孩子陷入忠誠兩難的困境，使會面成為離異後衝突的延續，孩子面對父母離異的生活挑戰，同時不斷面對此些會面狀況，長期反覆處於高衝突的情境中，積累會面歷程的負向經驗，使會面愈加困難。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梳理法院會面交往服務過程中的看見與發現，以執行會面交往服務之社工為主體，透過服務社工在汲取創傷知情照護知識後，運用於實務工作情境中的反思與討論，期望瞭解法院會面交往服務是否已具備及實踐創傷知情照護，進而針對現行服務方式進行檢視與調整，以增進服務品質，減少服務對象之創傷經驗。本研究共舉辦3場焦點團體，每場焦點團體由固定8名成員組成，加上帶領討論之外聘督導，參與者平均提供會面交往服務年資為4.25年（詳表1），透過將不同階段服務分次進行焦點團體彙整參與者的實務經驗，從創傷知情的視角檢視現行服務所運用的原則及策略，並探討服務尚待調整之處，提出相關研究建議。

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年齡	職類	社工服務年資	會面交往服務年資
A	女	40-50	督導級	> 10	9
B	女	40-50	督導級	> 10	8
C	女	40-50	督導級	> 10	5
D	女	30-40	社工	> 10	4
E	男	40-50	社工	5-10	3
F	女	30-40	社工	5-10	3
G	女	40-50	社工	> 10	1
H	女	40-50	社工	> 10	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肆、研究發現

本文將服務中心所提供之法院會面交往服務分為四個階段：會面執行前、會面執行中（準備階段）、會面執行中（進行階段）及會面結束，並羅列各階段所進行之工作項目，彙整服務經驗並萃取不同工作階段中，優先側重且符合TIC之原則及工作策略，並輔以相關實例加以闡釋。

一、會面執行前

（一）評估會面交往的可能性及服務策略，優先著重運用安全、信任、合作、選擇及賦權等原則

1. 與父母建立安全信任關係：會面協調員（以下簡稱協調員）會向父母說明其工作目標、角色與工作流程，釐清與父母個別社工之分工與角色差異；並向父母說明會面同意書內容及相關規定

之考量原因，確認父母理解後簽署同意書；協調員進而會與父母討論會面安全計畫，建立信任關係，使其對會面具安全感。

2. 與兒少建立安全信任關係：協調員會依據兒少年齡決定打招呼、建立關係方式，確認兒少喜歡如何被稱呼，協調員亦會向兒少自我介紹（例如：曾有諸多與相似處境兒少接觸的經驗），向兒少說明協調員的工作目標、內容及預告會面流程等，讓兒少熟悉會面場地、選擇玩具，增強兒少的選擇權，幫助其建立安全感及信任感。針對較年幼或具特殊狀況的兒少，協調員可評估初期建立關係是否須安排兒少與同住方一起會談，建立共同連結感，降低兒少焦慮。

3. 使用會面評估表（Visitation Assessment，以下簡稱VA表）（註1）評估創傷史：運用VA表評估父母之配合程度、性格、穩定度、親職能力、過往會面困境與創傷等，了解兒少對於會面的認知態度與情緒反應，透過觀察父母及兒少的語言及非語言行為，評估是否適宜及如何提供會面服務，避免兒少於會面中累積創傷。

4. 增加兒少因應會面狀況的能力與安全策略：與兒少建立安全暗號、讓兒少選擇會面時所處的位置等。

二、會面執行中（準備階段）

（一）會面室、等候空間、流程準備：優先著重運用安全及選擇之原則

1. 會面室環境及物品事前準備：依兒少年齡、心理狀態、創傷經驗準備合適之玩具及空間。例如：與探視方關係尚未穩固或首次會面時，準備帳篷供兒少躲藏或休息，以增加兒少安全感，並於事前協調關於送禮物、會面飲食或慶祝活動等。

2. 同住方等候空間、會面後離開路線安排：提供同住方可安心、舒適等候空間，避免與探視方直接接觸，藉由錯開高衝突的同住方與探視方至法院會面時間，避免會面前目睹父母直接接觸引起兒少不適或壓力。

3. 探視方、兒少進出會面室之順序、路線安排：透過妥善規劃兒少、探視方進入會面場所之順序以及兒少分別與同住方與探視方在等候空間上的距離，避免兒少在準備或會面時受到父母之影響。

（二）與同住方建立合作模式：優先著重運用合作與賦權之原則

1. 討論安心的路線與接送方式。

2. 瞭解同住方關注之照顧議題：瞭解兒少需求或照顧上注意事項，例如：會面過程中需叮嚀喝水、不得食用的食物等。

3. 降低同住方對會面的負向情緒（例如：抗拒、焦慮）：同理同住方照顧兒少的辛勞，並感謝其願意協助配合會面服務程序。

4. 提升同住方親職能力：與同住方討論，依案主年齡、個性等因素，同住方如何協助處理「兒少分離焦慮」、「兒少對探視方情緒」、「兒少抗拒會面」等情況。

（三）與探視方建立合作模式：優先著重運用合作與賦權之原則

1. 討論會面執行流程及兒少可能反應及其因應能力：與探視方討論，會面會以兒少利益為考量，將視兒少會面身心狀態，未必定能滿足其預訂執行之會面時間，提醒探視方保有彈性；另需協助探視方練習接納兒少情緒及回應方式，例如：若兒少表現疏離、攻擊，需給兒少多一點時間及空間，但仍能持續表達或讓兒少感受其關愛。

2. 瞭解探視方針對會面關注之議題為何，是否有其過往會面相關創傷經驗需預先整理。

3. 降低探視方對會面的負向情緒（例如：焦慮、生氣）：同理探視方無法會面的心情，感謝其願意持續配合會面的準備。

4. 提升探視方親職能力：事先提醒探視方預作功課，準備與瞭解兒少及該

年齡層感興趣的話題、遊戲。

（四）與兒少建立合作模式：優先著重運用安全、信任、合作、選擇及賦權之原則

1. 協助兒少熟悉會面場地：會面前帶領兒少熟悉會面場地，可與其一同佈置會面空間，增加其熟悉度及掌控感。

2. 瞭解兒少對會面之想法，並討論兒少的擔心及期待：再次與兒少進行會談，了解其想法和感受。

3. 再次確認會面安排流程：依兒少年齡、身心發展，進行會面情境模擬或說明，包含：會面時間長短安排、流程、需求、與協調員之暗號等，讓兒少進行遊戲選擇，增加安全感及控制感。

三、會面執行中（進行階段）

（一）確認兒少已準備好探視方進場：優先著重運用安全、信任及賦權之原則

1. 再次確認並評估執行兒少會面的可行性：為確保兒少對於會面交往執行之準備度，故會面執行當日仍會再次與兒少單獨確認其身心狀態，以維護兒少之利益。

2. 與兒少確認期待探視方進場方式：以兒少可接受的方式與距離，讓探視方進入會面室，並預先讓兒少知道，當其感到不舒服時，可隨時中斷喊停。

(二) 會面促進：優先著重運用安全、合作、選擇及賦權之原則

1. 運用協調員擔任橋樑，促進兒少與探視方的互動連結：運用媒材、遊戲等，評估邀請探視方加入之適當時機。例如：安排具互動性、玩家需輪流參與的遊戲，順勢邀請探視方加入互動。

2. 協調員示範如何與兒少互動：必要時可向探視方示範如何與兒少建立關係，例如：藉由兒少有興趣的話題產生連結。

3. 營造會面友善氣氛：協調員作為雙方的潤滑劑，協助引導互動或話題，並熱絡會面氛圍。

(三) 會面互動評估與介入：運用安全、信任、選擇及賦權之原則

1. 確保互動過程安全性：若探視方出現違規行為時，若勸阻無效，協調員可停止會面，避免案主再次創傷。例如：出現謾罵、批評同住方的言論，或不斷詢問、刺探兒少或同住方之隱私。

2. 確保探視方遵守會面規則：提醒探視方遵守規則，如兒少及同住方會將「守時」視為探視方是否「有心」想會面的重要因素。

3. 評估兒少的情緒、行為反應：若兒少出現較大情緒波動（例如：尖叫、哭泣），經安撫溝通無效或身心不適，評估是否中止會面。

(四) 危機處理：優先著重運用安全及合作之原則

1. 確保兒少安全，避免再次經歷或目睹衝突：當探視方情緒過於激動、同住方堅持進入會面現場時，應評估暫停會面。

2. 安撫及穩定三方情緒：協調員安撫兒少情緒，討論其感受、返家後可能狀況及因應方式，並視狀況與三方進行個別會談。

四、會面結束

(一) 確保結束及離開前的安全性：優先著重運用安全、信任及賦權之原則

1. 確認探視方無跟騷行為：交錯安排離開時間或路線，避免跟蹤。

2. 避免雙方衝突場面。

(二) 與同住方討論返家後對兒少的覺察與回應方式：優先著重運用合作及賦權之原則

1. 建立同住方對合作父母的共識：提醒同住方應遵守合作父母的原則，例如不主動探問會面過程，或在會面結束後即對兒少嶄露不悅態度。

2. 增強同住方因應與安撫兒少的能力：若兒少返家後有情緒，如抗拒再會面，鼓勵同住方同理兒少，接納其情緒、不要責備兒少，但仍可鼓勵兒少持續嘗試會面並表達其所想要之會面方式。

3. 反饋同住方的親職能力：肯定同住方能配合會面安排及支持兒少進行會面之具體作為。

（三）與探視方討論會面狀況：優先著重運用合作及賦權之原則

1. 反饋探視過程的優勢與提醒：肯定探視方於會面過程的親職表現，並提出提升親職能力的方法；提醒完成會面準備之回家功課，以利下次會面執行的順利。

2. 協助探視方情緒調控：協助探視方處理若會面交往執行不如預期之可能出現的挫折、失落、憤怒等情緒。

3. 鼓勵探視方積極扮演合作父母：為求會面交往執行之穩定，鼓勵探視方在共親職上能給予更大的彈性，以增加穩固或深化親子連結之機會。

（四）與兒少討論會面感受及返家因應：優先著重運用安全、選擇、賦權及同儕支持之原則。

1. 反饋並肯定兒少於會面過程的表現。

2. 協助兒少緩和會面後情緒及自我調節：教導兒少情緒調控（例如：思念、害怕、擔心等）。

3. 協助兒少因應返家適應：協助兒少建立返家後安全界線及自我調節情緒的方法，與其討論如何回答同住家屬的

問題：建立兒少返家後的支持資源（例如：兒保社工、心理師、老師、重要他人），並視兒少年齡與其討論未來可能的狀況與因應。

伍、策進作為與反思建議

我們依照TIC原則重新檢視在提供法院會面交往服務的歷程中，本中心已建立的工作項目，並藉此思考如何調整服務方式，期能讓父母及兒少免於再次受創；然此理念的實踐，亦需仰賴整個社會、司法環境與服務團隊的努力，因此除了以本中心為出發之策進作為外，我們也同時提出相關反思與建議如下。

一、加強創傷史的蒐集，及早辨識父母、兒少之創傷壓力反應

同住方、探視方、兒少三方在進入法院會面交往服務前，往往已經歷一段訴訟歷程，尤其父母伴隨著過往婚姻或共親職上諸多衝突等挫敗經驗，而這些情緒往往也影響著其接受服務的態度與行為，例如在婚姻中未被善待的同住方，也就堅信探視方不可能有能力妥適照顧兒少。而倘若協調員未能及時辨識出父母的焦慮反應可能與創傷有關，並以創傷知情眼光與父母互動時，很可能就會對這樣的父母貼上不友善的標籤，而在服務上也很可能無法貼近其需求，

進而影響工作關係的建立，雖中心所運用之VA表，已有提及創傷反應，但經過此次研究檢視與反思，不論是中心社工或協調員似乎均需要更有意識地去關注服務對象的創傷史，不管是藉由客觀評估工具或是會談過程，在服務初期即聚焦協助父母對於自我狀態的覺察與情緒之調節與梳理，讓父母可以感受到安全、信任，後續服務的推展才有機會更加順利。

二、針對協調員或服務團隊，引入創傷知情督導資源

創傷知情照護需要不斷的被提醒，每一個高衝突家庭都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受創的家庭，而來到我們面前的父母，可能往往仍呈現極度憤怒、不斷地互相攻擊，甚至也波及協調員，很多時候也讓協調員產生本能地防衛與負向情緒不斷推疊，導致服務難以推展，甚至協調員也同樣受創甚深，而產生工作的身心負荷；而創傷知情督導能有效提供受督者情緒支持以因應高壓及挑戰，同時也能協助受督者辨認出哪些個人議題阻礙其服務品質（Berger & Quiros, 2014）。因此唯有在服務場域中不斷實踐創傷知情照護的理念，同時當協調員也都能被同樣地對待時，才能讓協調員持續保有相關覺察與具備創傷知情的視角，得以提供父母或兒少最適切的服務；服務中

心團隊也在本研究產出的過程中，同步開始定期進行創傷知情團督，以強化服務團隊自身及服務過程之敏感度。

三、建構友善創傷知情法庭與會面空間

創傷知情的環境需要共創，不僅是協調員，而應是所有可能接觸到家庭成員的法庭工作人員均須了解創傷的影響，以共同建立起創傷知情的司法體系（The national child traumatic stress network, n.d.）；此外，Knoche與Miller（2018）指出創傷知情實務的做法可以是包含法院內針對被害人設立隔離等候區、孩童的友善等候空間以及讓法院整體空間保持在舒適的溫度；因此針對有法院會面交往服務需求的家庭設立專屬之會面交往空間，包括如何讓探視方、兒少順利進入會面室的動線安排，同時也讓會面交往空間的設計更加舒適，包括有適切的大小、明亮的光線、搭配溫馨的陳設、音樂等，將更符合創傷知情照護的精神。

四、嘗試結合社區資源或創建專屬會面交往場地

以服務發展來說，法院會面交往確實是近十年才開展的服務，因此過往在法院原有硬體設備中，並未納入會面交往空間的思維，相信我們也都認同一個三歲的幼兒和十三歲的青少年，他們對

於會面交往環境需求絕對不會相同，但也依著在現實情境中，在法院創造出新空間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或許我們應該開始思考是否踏出法院，與其他社區資源連結甚或自行建置，創造出更多可利用的會面交往空間，提供更適齡的硬體環境，例如有空間可以植栽或豢養小動物，藉由動、植物來輔助會面交往過程，讓親子互動可以更加自在，或是設有家庭情境般的設備，如烹飪等，也讓會面交往歷程更貼近親子間的自然互動與生活，讓父母及兒少可以獲取更好的經驗。

五、文化歷史與性別之觀點尚待服務經驗累積

本中心在遇到跨國、跨文化或語言的父母及兒少時，會根據其慣用語言安排合適的協調員，以確保會談和會面服務之流暢性，並調整相關文書使用語言，降低因語言隔閡而造成服務對象理解困難或對接受服務之顧慮。此外，協調員會透過會面執行前的會談，了解父母的文化及其對會面交往執行的影響，例如：華人文化重視過年，而部分歐美國家則較重視聖誕節假期，藉此思考合適的會面執行計畫，貼近不同文化背景的生命經驗及期待。惟盤整本中心近幾年服務之會面交往案件，本國籍非原住民的案件占93.5%，同住方、探視方或

兒少任一方為中國籍或英語系國籍各占3.2%，顯示本中心服務的跨國或跨文化案件仍十分有限，尚待經驗之累積以建立更具文化歷史觀點的服務方法。未來本中心將持續針對跨文化個案進行討論，並將文化脈絡影響納入服務考量，使服務提供能更具備文化及性別敏感度。

陸、結語

在法院涉及親權的案件中，高衝突家庭幾乎是常態，兒少面對父母分居、離異等家庭生活形態轉變，已承載著一定程度身心創傷，倘若又需長期面對與父母會面交往所衍生的高壓、衝突角力的情境，處在會面交往的風暴核心承受巨大心理壓力，兒少再次受創的風險可想而知。會面交往服務往往需要與大量處於受創情境中的父母或兒少工作，因此，本中心在提供高衝突家庭法院會面交往服務時，致力於引入TIC觀點，進行服務的深度反思及實踐，藉由整理服務歷程中優先運用的原則與工作策略，培養對創傷的敏感度，辨識並理解父母和兒少可能承受的創傷，並在每一次服務過程中給予父母及兒少更高程度的涵容與回應，創造減壓的氛圍，建立一個充滿同理且高支持性的環境，期許在陪伴每個家庭走過這段法院會面交往之路

時，都可以是舊創傷的撫平，而非新創傷的累積，進而減少未來反覆經歷創傷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黃心怡為現代婦女基金會臺北地院家暴家事服務中心社工督導；劉于瑞為現代婦女基金會臺北地院家暴家事服務中心社工副督導；蕭丞芳為現代婦女基金會臺北地院家暴家事服務中心社工副督導；李季蓉為現代婦女基金會臺北地院家暴家事服務中心社工專員；徐慈心為現代

婦女基金會臺北地院家暴家事服務中心社工專員；莊怡萱為現代婦女基金會臺北地院家暴家事服務中心社工專員；陳嘉鴻為現代婦女基金會臺北地院家暴家事服務中心社工專員；鄭又維為現代婦女基金會臺北地院家暴家事服務中心社工專員；蕭秀平為現代婦女基金會臺北地院家暴家事服務中心社工專員）

關鍵詞：創傷知情照護、法院會面交往、高衝突家庭

註 釋

註1 VA表對同住方與探視方評估面向包含：（一）配合程度評估：（1）遵守會面規則、（2）司法服從性、（3）過去會面的經驗與網絡合作經驗；（二）父母狀況評估：（1）權控、（2）情緒穩定度、（3）信用、（4）性格氣質、（5）對家暴態度、（6）對親近關係的反應；（三）親職能力評估：（1）教養觀、（2）施暴行為、（3）教養行為、（4）親子角色定位；（四）教育空間評估。對未成年子女評估面向包含：（一）分居/離異對案主的影響、（二）案主對於同住方家長與手足的印象與關係、（三）案主對於探視方家長與手足的印象與關係、（四）案主對於探視會面的意願及態度、（五）案主會面時的安排、（六）案主的個性/特殊狀況、（七）支持系統。

參考文獻

內政部（2024）。《父母離婚之子女權利義務歸屬》。https://www.gender 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DetailData.aspx?sn=aPi33EfnEATKPKjm9jJFBA%40%40&d=m9ww9odNZAz2R-c5Ooj%24wIQ%40%40

- 司法院（2024）。《地方法院家事事件子女監護權歸屬——按子女年齡與事件別分》。https://www.judicial.gov.tw/tw/dl-202121-3ef245a9e40b4595807d129604dc3d77.html
- 司法院辦理補助駐法院家事服務中心辦法（2013 / 2020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20175
- 兒童權利公約（2007）。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00062
- 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2022年7月1日）。〈爸媽離婚了，「孩」要見不見？高衝突家庭親子會面〉。https://www.38.org.tw/news/2/194
- 黃心怡、謝子璵、劉于瑞、宋名萍、蕭丞芳（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團隊）（2020）。《合作父母與親子會面：一群本土社工的看見》。啟示出版。
- 鄧學仁（2022）。〈會面交往之爭議問題與修法課題〉。《司法周刊》，2112，15-22。
- Berger, R., & Quiros, L. (2014). Supervision for trauma-informed practice. *Traumatology*, 20(4), 296-301. https://doi.org/10.1037/h0099835
- Felitti, V. J., Anda, R. F., Nordenberg, D., Williamson, D. F., Spitz, A. M., Edwards, V., Koss, M. P., & Marks, J. S. (1998).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Th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4(4), 245-258. https://doi.org/10.1016/s0749-3797(98)00017-8
- Herman, J. L. (1992). *Trauma and recovery*. Basic Books/Hachette Book Group.
- Judith S. Wallerstein & Joan B. Kelly. (1996). *Surviving The Breakup: How Children And Parents Cope With Divorce*. Basic.
- Knoche, V. A., Summers, A., & Miller, M. K. (2018). Trauma-informed: Dependency court personnel's understanding of trauma and perceptions of court policies, practices, and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cent Trauma*, 11(4), 495-505. https://doi.org/10.1007/s40653-018-0219-7
- Roberts, S. J., Chandler, G. E., & Kalmakis, K. (2019). A model for trauma-informed primary ca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urse Practitioners*, 31(2), 139-144. https://doi.org/10.1097/JXX.0000000000000116
-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14). *SAMHSA's Concept of Trauma and Guidance for a Trauma-Informed Approach*. https://store.samhsa.gov/sites/default/files/d7/priv/sma14-4884.pdf
- The National Child Traumatic Stress Network (n.d.). *Justice*. Retrieved August 18, 2024, from https://www.nctsn.org/trauma-informed-care/creating-trauma-informed-systems/justice